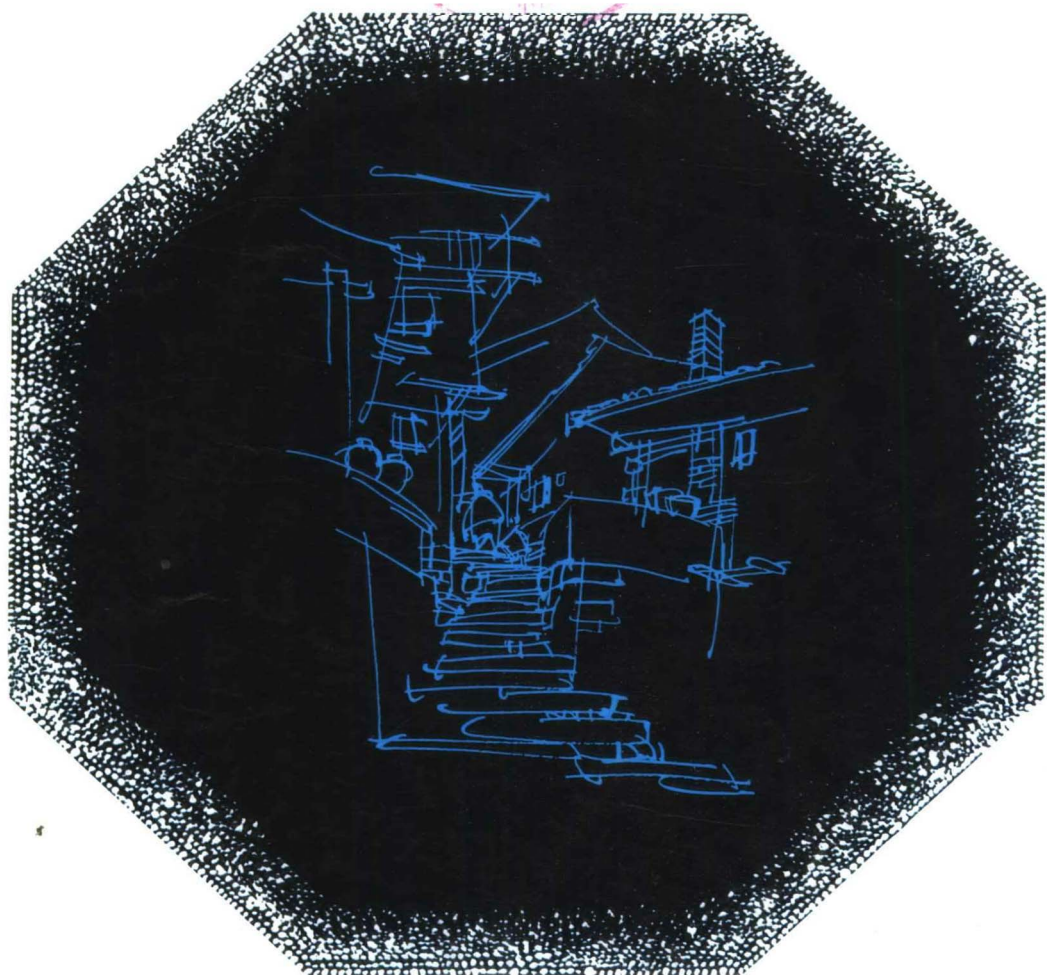


建筑师

JIANZHUSHI

51 1993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严迅奇建筑设计作品选



乐富购物中心二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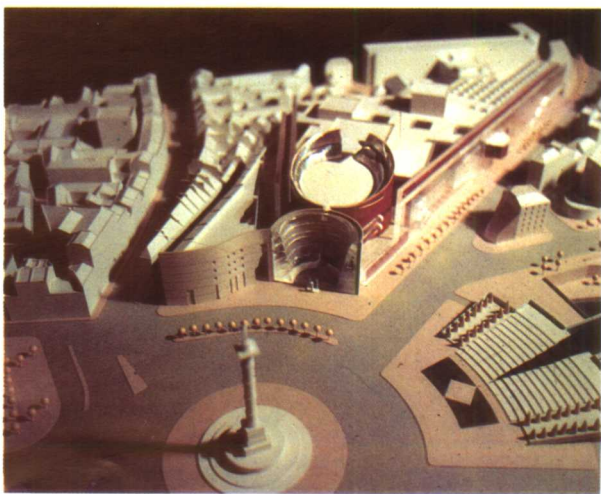


万国宝通广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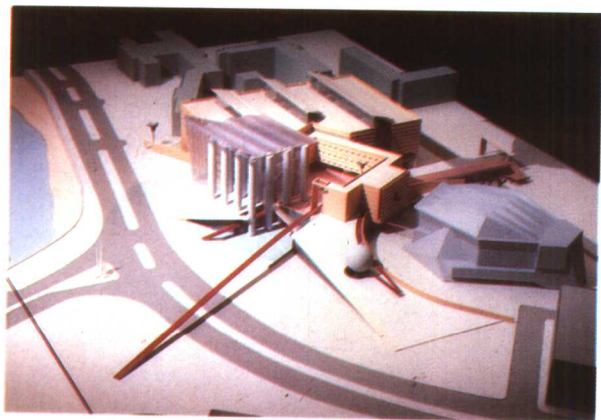
万国宝通广场



巴黎巴士的歌剧院



严迅奇建筑设计作品选



亚历山大利亚图书馆



天津国际展览中心



柏丽大道

北斗山庄



天玑居外观



玉衡居外观



开阳居外观



天枢居外观



天璿居与天枢居外观



天权居外观

北斗山庄



瑶光居外观



瑶光居小厅

建筑师

(双月刊)

51

(京)新登字 035 号

第 51 期 1993 年 4 月(逢双月末出版)
中国建筑工程出版社
《建筑师》编辑部编辑

主 编:杨永生 王伯扬

副主编:于志公

编 委:(按姓氏笔划为序)

邓林翰 白佐民 刘宝仲

刘管平 庄裕光 阳世鏐

吴竹涟 杨君武 沈福熙

洪铁城 黄汉民 彭一刚

谭志民 黎志涛

责任编辑:于志公

美术编辑:张树杰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西郊百万庄)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市密云县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毫米 1/16

插页:2 印张:7 字数:240 千字

1993 年 4 月第一版

1993 年 4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5,510 册 定价:5.80 元

ISBN 7-112-01958-3/TU·1496

(6981)

■第二届中国建筑传统与理论学术研讨会* 论文选登

- 2 论中国建筑环境中的传统“中介”文化 何重义
谈谈中国传统的书院建筑 张 卫
8 武当山道教建筑
11 ——兼谈明代皇室家庙营造思想 祝建华

■建筑理论研究

- 17 谈莱特思想的渊源 魏光莒
23 从建筑生态学看“风水”中的“穴”理论 汝俊峰 刘宝仲
26 略议“楚文化建筑”和“建筑文化与汉派风格”问题 高介华
30 从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转变中的建筑 王 戈

■建筑设计研究

- 34 北斗山庄
——一个继承传统与文化建筑创作的探索实例 戴复东

■建筑设计方案

- 40 北京通产购物中心及世界精品大厦设计
建设部建筑设计研究所方案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方案

■中国传统建筑研究

- 71 干栏建筑研究三题 杨昌鸣

■香港著名建筑师

- 104 严迅奇

■建筑师札记

- 107 北窗杂记(二十一) 窦 武
110 加强评论,提高水准
——在 1992 年中国建筑学会理事会上的发言 潘祖尧

* 此次研讨会由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由天津大学建筑系承办,《建筑师》编辑部、《古建筑园林技术》编辑、天津市文化局、天津市建筑设计院合办。

论中国建筑环境中的传统 “中介”文化

何重义

一、中介的含意

人类文明奠定了对空间的基本概念，人的时空感不是具体的物象，而是经过抽象化了的独特空间形式，我们通过抽象化的概念即“中介”现象去认识时空，去分析时空中的一切事物，去理解一切现象对人的影响。

从符号学的观点来看，我们对客观对象的认识和理解，是从能指一下就转化为所指，这种转化，正是人类文明赋予现代人的一种理解判断，可说是一种智慧。这种智慧是独一无二的，是人类统一性和合法性的宇宙秩序的概念。这个概念不是对空间关系的具体理解，而是抽象理解。人类经过文化进程的漫长历史，所演绎出的抽象理解，逐步积久成为人类共识的宇宙秩序，用这个抽象的概念准尺去观察事物，去领略造化，去创造和求取一切，为了自我的内心平衡。生活中的这种宇宙统一概念，并非固定不变，它处在不断演进中，不同时间、不同地点、不同民族都有其独特的抽象化了的宇宙观，有其对时空的审美意识，有人类的共性，也有地域的差别。他们对事物的认识带有一定层面的主观意识，是预先假定了的描述（representation），是一种模式化的空间。

就我们对建筑理解而言，完全依赖于这种经过人加工过的审美意识，以它作为“中介”去理解建筑，去塑造建筑环境，从每一个小小的生活起居空间，到院落、小区、以至城镇。

只有弄明白引导和主宰规划设计的指导思想，才有可能为人类文明创造完美的生活环境。

二、回顾建筑创作走过的道路

现在我们进行建筑创作，还习惯于从实体空间和物象上去考虑问题，把固定了的物体作为设计创作的唯一依据，忽略人类文明的抽象意识，和对建筑时空

感的要求，把最富于生活气息的建筑变成呆板的几个平面板的组合。人的一切活动被禁固在仅仅为生理需求的六面体内。设计者很少注意到人的精神需求，生活在房屋里的人很难主宰这个固定化了的空間。

近现代对建筑的追求，虽然也提及精神这一重要因素，但往往只停留在事物的表面，所谓的科学构思，只不过是机械地把人与物当成一种具象事物去处理，那柯布西耶的人体尺度也只不过是具体化了的人作为空间的量度。建筑领域被停留在静态之中。我们对待构图的思路是沿着这条线索去追求的。这可称之为建筑创作的初级阶段。

从古代人类穴居开始，人类的建筑的构成是以人的意识为准则。古代人从生活中吸取经验，总结出建造房屋的规律，往往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正如现代人知道气的功能，却还没有把握气的规律一样。自古以来一般市民或农民，自建居室常按照传统习惯去营造，其中参杂一些民俗和迷信，以求吉利，常常选定良辰吉日，立架上梁，保平安、求富贵，尤其在中国的农村已习以为常。现代的城市里，建高楼大厦，谁也不再理会这一套，并没有给房主带来多少不利。西方现代文明正是在这种高楼如云的环境里形成的。虽然一栋建筑的优劣与良辰吉日并无外在的联系，但对那些生活在习俗环境里的人来说，却在心灵中把吉祥与生活环境紧密联系在一起。这并非迷信，而是人类的一种心理因素。现代科学文明并没有完全打破这种心理因素，宗教仍然是现代人的精神依托，传统的习惯环境对人们所起的作用不可估量。人需要文化去陶冶情操，纯物质享受不可能代替一切，尤其无法代替心理文化因素。

当20世纪物质文明给人类的享受达到一定高度时，人们开始寻求精神享受以满足种种心理因素。物质财富发达的国家，渐渐意识到，人不能被物化，迫切需要走出这个禁锢人类精神的静状世界，需要回归到自由的精神世界里，需要自由自在地遨游在宇宙之间。

何重义，北京建筑工程学院教授

“环境学”的诞生正基于此吧!

现在大家所热衷的环境学仅局限于环境污染、环境空间、环境生态等等,这些直接影响人类生存的问题当然重要,这些因素是纯物质的,是直观的东西,暂归之为人类第一层保护圈。

人类生活在宇宙之中,地球是宇宙的一部分,它脱离不了宇宙的固定轨道,脱离不了宇宙对它的制约。日、月、星际对它的影响,四季周而复始、地域年节,这些宇宙规律对人类有一定制约,人类的身心一定要适应这一切自然天象,否则便难于生存下去,这种适应性应归之为人类的第二个保护圈。

人为万物之灵,人主宰了地球,人类之所以超越其他生物,正因为人类有一个文明世界,这个文明世界是人类思维积久的结果,形成人类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而更为重要的是精神文明,它内涵一种宇宙秩序,赋予规律性。有时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它往往以一种抽象化的习俗概念,经历一个世纪一个世纪被承继下来,被人们视为天经地义的道理人们赖以指导一切行为,把它作为影响人类生活的媒介——“中介”。通过“中介”去观察事物,分析理解事物,去领略事物的美妙。所谓触景生情、意会而不言传、对一事一物的情趣等等,都是依赖思维里的中介意识去完成的。建筑上常借助于符号去象征,符号的作用得依赖于“中介”意识去完成它的使命。如果我们忽略了这一过程,认识不到恰当地应用符号去激发起中介思维反映,那么这些不相干的符号只不过是一堆孤立的现象,相互之间起不到有机的关系,更难象征某一事物,达不到引起联想的作用。在建筑创作中经常见到的那些多余的、生硬的装饰,正是因为对中介现象不理解,滥用符号导致的恶果。

应该认识到中介意识并不是静止的思维概念,它确是一种动态。同是一物或一事,因地、因时、因环境的条件,主体的不同,这个中介意识常处在不断演绎之中,它是在相对比较之下形成的一个抽象概念。

举例:一栋住宅的小院,对居室相对而言,它是外,是一个家庭的户外活动场地,生活在这个小天地里,会感受到大自然的生机,会引起无数的联想,过去的、未来的以及人际之间种种往事。院子对街道而言,这个“外”的中介概念便转换成“内”,由它而引起的种种记忆和情怀绝不是某一固定的象征。显然这与符号学的基本概念,“三合一”的符号关系:图像、标志、象征,有所不同。符号标志所显示的象征是一种被承认的固定不变的模式,而中介虽也是一种象征性的概念,却并不是固定的,它反映一种静不定现象,中介所反映的概念只是对应的关系,相互制约的关系,相互关联却又相辅相成。由此可见,建筑环境构成中的种种中介现象对建筑创作尤为重要,比之符号影响更大。这些中介关系将导致对建筑构成学的进一步深化,从“中介”哲学这

个范畴出发,帮助建筑构成由第一个层次—物象的环境空间进入第二个层次—抽象的意志领域,即人类的文化领域。

“中介”的概念还内涵一种模糊性,它对环境的概念并不是“非此即彼”,以环境空间大小、特征、造型,以至于美的标准,并不绝对清晰,是脑子里的“亦此亦彼”,相互交织、渗透、穿插、复合,界限模糊的过渡性形态。

三、环境空间的“中介”现象

人类的生活依附于环境,人们时刻都在为追求美满的环境而奋斗。人们从儿啼到成年需要一个完美的环境供他成长,青少年时期对环境的需求比之幼儿时期更为复杂多样,除了生活环境,还需要有较好的学习环境,不难理解所谓的学习环境应包括两方面的内容,物质环境与精神环境,即我们常说的学习风气。“昔孟母,择邻处”,孟子的母亲,为了使自己的儿子能长大成才,选择一个有助于子弟求学的好环境,具有好的社会风气,免得孩子染上恶习,要刻苦学习,成为栋梁之才。由此,我们应清楚地认识到,“环境”的含意既包括物质的属性,也内涵人们的意志概念。而这种意志和物质之间常借助于“中介”关系互相过渡,达到完美。

引用鲍姆嘉通一段话:“美的客观基础就是完善,即事物同它们的概念相一致,完善既存在于纯粹认识(理性)和模糊的表象(感性知觉)之中,也存在于愿望能力(意志)之中。由于有这三种能力,完善就表现为三个方面:真、美、善。因而,对同一个本质就可以有不同的感受”。

他清楚的说明对事物的完善评价存在于理性、感性和意志之中。我们对环境的任何评价也是通过“理性、感性和意志”去完成的。从某种意义上讲,意志是作为理性与感性的中介参值促成感受的明朗,同一个物质之所以有不同的感受,正是因为意志(愿望能力)所起的作用。这种中介现象比之理性和感性对评价事物显得更为重要,许许多多事物的论证往往以意志为转移。对建筑造型和环境空间的审美意识更是如此。建筑领域内的审美意识从来不是凝固的,它随时随刻在动荡,它受制于可变的中介参值。我们必须把握住这个易变的中介参值,以求获得完美的结果。

就一个城市而言,城市环境的中介参值绝不是一个单一愿望,它是多种因素互相交织所行成的集合体,它包含人们的审美意识、社会意识、传统习俗、时代精神、经济和物质条件等等。这些看不见的诸种因素是“软件”,是摸不着的。我们习惯于简单地从“功能”这一最有效的硬件去考虑问题,而忽略这些软件对硬件的影响,即中介值对理性功能所产生的制约作用,有的甚至起到指导作用。无论国外古城,或中国旧的城池,

它们的布局大多数并不完全取决于纯功能的要求,人的诸种意识所起的作用可能还要大一些,近代西方的现代化城市,走过一段功利主义的道路,人们开始感受到生活在这种泛功利的城市中的苦闷,觉醒到资本主义时代唯经济论所建起的这些大城市缺乏生活气息所带来的严重问题。归根结底问题的症结完全是因为忽视人的自在意识与城市功能之间的中介关系,这种中介关系既包含意志对理性的制约和指导意义,即:内涵一种潜在的、此时此地暂时被掩盖的重要思想,近期尚未寓见到的人们所要追求的某种特定环境,如未来的文化生活对环境的诸种要求,也许眼前还无法达到的环境需要,那么再过几十年,那时候人们的思想境界是什么?城市环境要不要考虑未来年代人们的需求,如何从现代的环境过渡到未来的环境,我们必须借助于中介关系去完成这一使命。

首先要从思想上理清这些中介关系,然后将这些中介关系贯彻到实际中去,使现实的条件包含未来的因素,这样才能由近期过渡到未来的年代,避免被眼前的表面现象掩盖人们更高的追求。

在这里并不是要脱离现实去探讨问题,现实的東西也绝非纯理性和表面上的感性所能概括,意志同样具有现实的意义,只不过因时、因地、因人而异罢了。前两年我们还认为建造小别墅是不现实的,不仅是经济力量的问题,还存在一种反享受的思想,认为住别墅是一种超越,是脱离群众的作风,是理应反对的。对待城市环境空间的布局,则更为突出,很少把群众的精神需求作为指导意志贯彻到当前的城市规划中,从个体到群体设计很难找到几处实例,能够把人们对环境空间的意志概念贯彻到设计中去。评论一栋建筑的好坏,首先要评论它的内部功能是否适用。就其外部而论,既包括实用功能,也具有精神功能的一面,不同类型的建筑它具有的造型特征有所不同,如北京图书馆绝不是政府大厦,也不是文娱中心,图书馆的环境造型应突出表现“文化”的特征。离开了这一点,它将失去图书馆的精神所在,如果我们还停留在过去那一套机械唯物论的设计方法,仅仅从事物的表面现象,从牵强附会上作文章,只是追求外在的感知,忽略其内涵的实质,所得出的结论是经不起时间考验的,一栋建筑的特征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我的理解是,确定一栋建筑、一个群体或一个城市的特色,首先看它整体效果,给人们总的感受是什么,环境比建筑本身更能反映它的内涵气氛,也就是说环境总体效果与人们的中介意识的关系,人们对于代表中国的国家图书馆应表现出的文化性——气质的内容是什么?通过中介意识去寻求这个答案,结论是令人失望的,北京图书馆主要入口的布局非常局促,形式上一味追求古典建筑上的小符号,忘记了中国优秀的环境空间布局特征。简而言之,即空间序列

关系,这种空间序列关系不只是空间表象的造型关系,重要的是通过表象的造型空间相辅相成关系,内涵民族的文化意识,当人们置身于这一系列空间之中,通过对外部空间的感受,激发起思想深处的共鸣,这种下意识共鸣,正是环境空间中介值所起的作用。

许多大型建筑,虽然设计过程中也在追求某一目的,有其立意,但可惜没有抓住事物的本质,往往流于形式,舍本求末,如香山饭店不管建筑设计多么精心,却忽略了它所处环境的中介关系,葬送了皇家园林应保持的环境气氛。从尺度到造型都不相宜。

四、中国传统文化在建筑环境中的“中介”现象

环境是中国建筑活动所追求的目标,几千年来我们沿袭这一优良的固有传统文化从事建筑的一切活动,以环境作为建筑创作的准则。

在个体建筑造型上,中国建筑远不如西方建筑那样丰富多彩,也许我们的祖宗先贤在对待建筑创作上把注意力集中在整体环境上,用简单化一的个体建筑组合成丰富多彩的环境空间,而这些形形色色组合空间,不单纯是从生活功能出发所构成的结果,而是凭借传统文化的意志去塑造环境,这些因时、因地、因人所创造出来的空间——是把人的物质需求与精神追求合而为一,融为一体的结晶。赋予人的情趣。从家庭宅院到城市,从广大农村到县镇,从小到大,无不在环境创作上下功夫,用意志去增色形象美,塑造一个更为完备,赋予启迪的生活环境,借助“中介”关系,以提高环境的审美价值。

1. 城镇环境

中国古代的城镇与西方的城镇不同,西方古代城镇多数是以城堡为中心,围绕它分布若干聚居区,自由扩展而成。而中国古代城镇自周代以后,沿袭建城的制度、讲规矩、城池方正,街肆井然。

(1) 中国古代城市规划的礼制

中国古代城市规划的礼制始于周,据《周礼·考工记》关于城市规划的制度记载:“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前朝后市,市朝一夫”。虽然后人建造的城镇并不是严格按照这个制度行事,但其布局基本没有超越这个制度的规定模式。以宫为中心的都城规划结构一直沿袭到明清,元大都的兴建,奠定北京城的规划结构,“左祖右社、前朝后市”,中国古都几千年来一直因袭这种格局。宫城坐北面南,形成一条纵贯几里的南北中轴线,这便是全城规划结构的主轴线,作为都城的基调,其他一切设施按规矩对应布置,一切道路体系以南北轴为准绳,经纬分明,无论道路主次,都是东西向和南北向,方正规矩,见不到放射线的道路。这组方正的大街小巷构成整个城市环境,人的一切活动被禁锢在内向院落,中国旧城

市的街头巷尾很难找到扩大的城市广场，与欧洲城市多广场的布局绝然不同，这并非功能所决定，而是千年来礼教意志所给予的影响，涵蓄内向的意志与墙的围合空间不谋而合，这是中国人几千年来的审美价值观。

(2) 天人合一、五行之说对城市布局的影响

“中国哲学中的天人合一观念，源于周代，先秦儒者有所发展，孟子提出“知性则知天”的观点，汉代董仲舒提出“人副天数”的观点，提倡“事各顺于名，名各顺于天，天人之际合而为一，因而通理，动而相益，顺而相受”“以类合一，天人一也”。至唐末，天人合一的思想有了进一步发展，宋张载明确提出“天人合一”的命题。他说“儒者创因明致诚，因诚致明，故天人合一”。“由太虚有天之名”，他认为“天”是无限的客观世界，主张“本天道之用”，把天之用与人之用统一起来”。（以上引自文化与哲学——张岱年著）

人是大自然的产物，时刻处在天地之间，人与天地（宇宙）、万物构成一个整体，人的一切行为受制于天，宇宙的动静变化时刻对人都带来影响，中国古代先贤早在几千年前就观察到这些现象，故有《周易》的出现，《周易·系辞下传》：“易之为书也，广大备悉，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两之，故之：六者非它也，三才之道也”。在易书中也分析到天地阴阳互补的道理。《周易·系辞上传》：“一阴一阳之谓道”，“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易书把阴阳、柔刚、仁义视为宇宙万物之道，相反相成，对立统一，构成了和谐互补的整体环境。人的一切行为必须顺应这些规律，才能完美地生存繁衍。

古代先贤归纳总结天、地、人“三才之道”，制定了八卦和六十四卦，作为人的一切行为的准则。后人进一步发展，观察到大自然五种要素：水、火、木、金、土，五行与人的关系，先秦《洪范》提出五事、五福、五方、五色、五常、五脏、五官等等的对应关系：见表

五行：	水	火	木	金	土（地）
五方：	北	南	东	西	中
五色：	黑	赤	青	白	黄
五常：	仁	义	礼	智	信
五脏：	肾	心	肝	肺	脾
五官：	耳	舌	眼	口	鼻
五事：	貌	言	视	听	思
五福：	寿	福	康宁	攸好德	考终命

这些对应关系虽然牵强，但是，中国的学术思想却受这五行说支配，建筑领域深受其影响。这些观念已渗透到城市规划 and 个体民宅，风水学已遍及整个中国。

历代都城建设都是遵循“礼制”、“天人合一”和五行阴阳说进行规划布局的。汉长安城墙东西南三面各开三个城门，唯北面只开二门，因宫城居北，免于泄气，

与周王城四面皆为三门不同，因周王城居中，无泄气之患。唐长安城其规模比汉长安更大、更方正规矩，遵循三门之制。采取南北主轴线的对称布局形式，南北三条主干道直达南面三门，东西三条干道也直垂东西三门。元大都同样按长安城的模式，街道采用东西轴线垂直南北轴线形式，构成一座长方形的城，东西长6600米，南北长7400多米，有城廓三重，分外城、皇城和宫城。所不同的是到西山之水入城，沟通通会的漕运，调济大都城的气候，这些都是客观上的好效果，在规划思想上还起到一个阴阳互补的作用。明清承继元大都的城市布局，城四周共设九门，三套方城，内阴外阳，内城为阴，外城为阳，南门三，取象天，北门二，取象地、皇城居中，设五门，取象人。则天、地、人三才皆备。以皇城为中心，南有天坛，北有地坛，东有日坛，西有月坛，则天地日月星辰皆祭！为求得五谷丰收，另设先农坛、先蚕坛、太岁坛、山川坛等。

宫城采用“前朝后寝”之制。前面三大殿，象征天子之尊。东西设十二宫。宫城中建筑的位置排列，以及宫殿的名字象征宇宙。左建太庙、右建社稷坛、南有正阳门、天安门，北有神武门、地安门。地安门之外设市，按“前朝后市”之制。

中国古代都城的环境因受制于礼，街道横平竖直，整齐划一，城市里的环境空间缺乏变化，色彩也受到礼制限制，除了皇室的房屋，百姓是不允许用色去装饰房屋的，整个城市街区巷道全是一片灰暗的色调，烘托出宫城的红墙黄顶。城市的生活空间除了集中的几处“市”而外，老百姓只能在自家院内活动，别无他处公共活动场所。难得找到街区的广场，这正是中国礼制所造成的结果。

2. 居住环境

居住环境以人为本，一切取决于居住人的要求，但中国人并非以自我为中心的人，每个人从生下开始便受制于社会各方面因素的影响，社会风俗、宗法、伦理、皇权等，而人们所塑造的理想环境，无不打上这些世俗和礼教的烙印，以求吉利。中国人所因袭的这种理想意志，在建造自己家园时所起的“中介”效应远远超过西方人。

(1) 北京四合院所反映的宗法礼制

儒家的伦理道德观对中国人影响很深，由此确立的家族宗法制延续几千年，三纲之纪，五常之道成为宗法的准绳。中国古代社会以此作为提高个人的修养和稳定社会秩序的规范，为求得一切行为的稳合，居住环境无例外的也得按老幼尊卑安排。四合院的形成与这一套宗法家族规范有一定联系。北为尊，左为上，故四合院的北房左边居室为一家之长的居室，左右厢房是晚辈的居室，倒座及后院下房是供仆人们居住的房间。北房堂屋布置讲究，是专为长者起居和接待宾客的生

活环境,一般女流晚辈是不能随意来这里的。对称轴线的格局不仅体现在四合院内,连堂屋这间小小的生活空间也是按轴线对称布置家具的。堂屋正中悬挂中轴大幅画卷,以松、梅、福、寿为主题,正中设供案祭祖,摆八仙桌,左右放太师椅,这一切安排显示出礼教庄重严肃的气氛。

(2) 风水说给房主带来的心理感应

中国古代先贤创造的八卦为风水学奠定了理论基础。风水堪舆具有一定科学性,同时也掺杂一些民俗和迷信,风水之所以广泛流传,受到信赖,主要在于它对人们心理上所产生的感应。人们生活在复杂的社会环境里,希望获得美满的生活,渴望自己居住的这个安乐窝能为他开脱一切,创造一切,去凶求吉,发家致富,造福后人。凡建房必择地、定方位、确定大门的朝向,根据方位及四境的关系,左邻右舍的情况,以定房屋的高低,这里也包含一部分环境效应的科学道理,更主要的免于房屋犯凶煞、保平安、求吉利,能安然宁静地生活。

堪阴是为死者造坟,堪阳是为活人建房所总结出一套规律性的信条,房屋建设受到一定制约。同时也制定一些辩证的解释,以解决特殊情况下难于解脱的矛盾。让房屋的主人在心灵上求得平静。这一切都是为了取得心理效应。许多吉利的解释同时也为生活在这个环境里的人带来无限的情趣。姑往言之,姑往听之,聊以自慰。

(3) 生活环境的装饰作用

中国人重哲理,讲风俗,用寓意比兴的手法,借助一些符号,以获得心灵中的吉利。

在每一个小小的居住环境里,无论院落大小、房前屋后、屋内户外、地面天棚、墙壁脊顶、铺地种植、陈设摆饰、对联扁额,以及服装鞋帽等等,凡与生活有关的一切事物。总是巧妙利用,达到象征的效果。

如照壁上的福、禄、寿、喜、喜鹊登梅、松鹤延年、麒麟送子、龙凤呈祥等等,近年来大家喜欢倒贴“福”字,象征福到家门之意。

院内种植的花木多以石榴、海棠、松、竹、梅、菊、荷、莲等等象征多子多孙,岁寒三友之意。

外檐内檐的一切装修,多用一些吉祥如意的花饰、图案作象征。如如意、蝙蝠、寿字、卍字、梅花、宝瓶,以及一些受人欢迎的故事图案来装饰墙头、隔扇。如桃源结义、二十四孝等等。

联匾的装饰效果更能反应主人的情趣,对人生的追求,它远远超越一般的装饰效果,它内涵中国人优秀的文化传统,它给这个居住小环境增添无限光彩,这一切必须通过个人的修养,文化层次的意志的中介关系去完成。

3. 居住外围生活环境

6 建筑师(51期)

在中国古旧的小城镇和村落里,到处可见到小小的土地庙,它是供奉土地爷的特有小屋。许多人为他烧香,为了保平安,这虽然是迷信,但时至今日,像这样的土地庙,在广大农村仍到处存在。这是一种传统的生活现象,在村头巷尾为环境增添了一份内容。

一座县城,在它的城郊和四周总要有目的地安排一些富于文化内容的景点,一方面为了风水的要求,更为实际的是为居民提供户外活动场所,有时冠以“八景”的美名,成为一座城镇的名胜古迹。“塔”几乎是中国城市必备的点景建筑,用以镇风水。城市外圈的“八景”久之便成为县城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每逢佳节,人们争相游览,三月踏青,九月重阳登高。而这些景点常常点以宗祠、寺院、观阁、楼台、为游人活动提供休憩场地,丰富景点的内容。这是整个城镇不可缺少的精神世界,是中国传统文化重要组成部分。

而那些景色秀丽的山山水水,则更富于诗意,常给每条河流、溪谷、山岩、古木取以美名,编造许许多多令人神往的故事,给本乡、本土的一草一木赋予生动的活力,把大自然与人生融为一体,这正是中国传统文化用意志所创造的生活大环境。

4. 民风民俗的环境观

前节所谈的这些生活环境现象,多少都受到民风民俗的影响,礼制对环境的构成也起到一定作用,除了城市布局、四合院的构成受制于礼制。给村落的布局同样带来影响。

现存的中国古村大多数是同姓同族的村子,这些古村经历几百年,有的达几千年,仍未解体,归其因,乃宗法家族观念内聚的力量所为,大家熟知的浙江永嘉楠溪江畔的芙蓉村和苍坡村,都是近千年的村落,他们不仅有各自的村规族规,村子的布局也具有文化含意,芙蓉村按七星八斗布局,苍坡村按文房四宝设计。村内宗祠位于村中心地带,是村内最神圣的建筑,是全村的精神支柱。中国其他地方都是把宗祠安置在风水最佳的位置。建筑品位最高的房屋,以光宗耀祖,显示本族力量。它将是本族人团聚中心。对村落而言,也是聚落中唯一最宏伟的公共建筑,它集中表现这时期民间建筑的文化特征。它象征这族人的精神,是内聚族人的力量。

在中国各少数民族地区,村落四境也有那些反映民族习俗的生活环境,这些环境是与自然环境结合一体的。他们往往选择一处开阔的坡地作为节日活动的场地,也有的选择一座名山作为节日活动的地方,如湖南靖州飞山,山上建有庙宇,山下有宗祠,是这一地区侗族聚会的胜地,飞山是侗族的象征,每年都有侗族的后人来自四邻各地朝拜飞山。

如西双版纳的缅寺,围绕它所构成的环境,是傣族人民的象征,是村民朝拜的圣地。

侗族村寨外的廊桥,它横跨溪谷,不仅是村寨对外联系的桥梁,桥上有时还供奉神位,它与鼓楼一样,是侗族村民日常聚集的场所,它的规模大小,造型精美,象征着本村的兴旺发达。不同的风俗形成各色各样具有象征意义的环境。

五、继往开来,把握现实生活中的中介特质

人的审美意识,是意志的产物,在现实生活中一切客观事物,无不通过意志的中介关系去寻求答案。建筑创作客观上是塑造实体,而创作的指导思想却是意志,即“立意”。设计任何一栋建筑都有意无意地受制于自己的思想意志。毫无疑问,建筑客观上是会反映创作人的“立意”的。好的作品既符合现实生活需要和人们的审美意识,又经得起时间的考验,这是永恒的创作,是设计者的祈望。但在我国经济迅猛发展的今天,所涌现出的一些建筑和城镇,表面一片繁华,却存在有待研究的问题。提几点看法,供大家讨论。

1. 当前我国城、镇、村落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1) 单一追求物质生活的需求

人们常说,经济发展,加速基本建设是客观的需要,前进浪潮无法阻挡。但在前进中缺乏全面观点,把物质追求当成唯一的发展依据,没有意识到伴随物质追求潜在的精神需求,实际上物质与精神是不可分的,任何物质都会给人们带来心灵感受。而这种感受是与人们的文化素养息息相关的。文化素养具有深刻地传统烙印。同时也不断地接受外来文化影响。无论城镇规划、村落建设、个体设计,在设计中必须全面地把功能需要和精神需求以及潜在意识结为一体,综合分析,这些相辅相成的因素都应包容在设计中。

(2) 近视眼前利益,一味求新,忽视传统观念的文化内涵

现在我们已经走出那条只重视社会效益,不注意经济效益的死胡同,但不幸的是又步入一条近视眼前利益的窄道,简单地把人的审美观放在钱眼上。过份追求经济效益,不理解人的审美意识与经济效益之间相辅相成关系。人的审美意识具有一定传统性和习惯性,这是一种潜在意识,它是传统文化给生活在这个文化圈内所打下的烙印,虽然它在外来文化影响下不断地演进,然而它不可能一朝一夕就脱胎而出,变成一个与旧文化毫不相干的新生儿。我们需要新,迫切希望改变落后面貌,近几年形形色色建筑像雨后春笋拔地而起,改变过去青一色的沉闷气氛,是令人鼓舞的。但如果不注意它们之间的关系,忽略建筑群之间的整体效果,忽略环境效益,将是一大遗憾。许多高楼大厦并没有经过精心规划,细致推敲,个自为政的显示自我,矗立街头,这是欲速不达所带来的环境失调。这些只不过是环境表象的失误。需要我们进一步深思的倒是每一座高楼

大厦除了它本身的功能给社会所带来效益而外,作为城市的一部分,它对于城市居民日常生活和休息以及精神世界是否还有一份义务,第一它占据城市空间,第二它的形象时刻都在影响居民的精神生活。难道一栋大厦不该尽这份义务吗?而这个义务应立足于中国人传统的习俗,把人们生活中的许多细节融汇于这些高楼大厦户外的环境之中,让城市的居民自由自在地涉足在这些环境之内,而不是拒之于外。进一步把那些人们熟知的传统文化纳入大厦规划建设之内。我们要善于借鉴外来文化,不要停留在形式的抄袭上,旧的符号也不等于是传统,要真正理解并把握传统的生活内容,把生活中的优良传统观念与新的内容结合起来,创造出赋予新意并内涵传统意识的整体环境。

(3) 村镇建设盲目向城市看齐,忽略农村生活固有的田园观。

我国农村长期处在贫困的境地,村落和乡镇濒临破产。城乡之间的经济相差悬殊。一旦农村的经济获得新生,突飞猛进地发展,向城市看齐,成为一种规律,这并不为奇。冷静考虑,这是不正常的现象。虽然历史上的大小城市都是由乡镇发展而成的。但20世纪的今天必须从大环境观这方面考虑,我们不能再听任这些新兴的小镇毫无规律地发展,尤其是向旧的商业城市的形象发展,这些缺乏生活气息的旧街道早已成为改造的对象。近几年来那些爆发的乡镇正因袭城市一条街的形式发展。他们不理解,也认识不到一条街的种种问题,待它们尝到苦果时,为时已晚。问题出在村镇规划的指导思想上。认为村镇规划可以简单抄袭城市规划的法则,这不仅因为对村镇缺少了解,不认识村镇在大环境中应起的作用,村镇在大环境中应处在什么地位。就村镇本身而论,它的传统环境观所内涵的因素很多,不单是农村的经济因素能概括,小农经济对环境的构成有一定影响,但每个地区的地域特点、传统风俗习惯、生活哲理、伦理关系以及风水观念等等无不深刻地反映在村落环境中。每个地区都有他们自己的固有田园观。这种田园观对一个聚落社会的稳定具有很大的影响。忽略这一关键因素,不仅仅对农村的田园环境的发展不利,对农村的农业生产也会产生不稳定作用。我们并非要保留那些落后的观念,而是保留并发展农村直朴的情操,热爱大自然的感情,改造落后一面,完善优美的田园环境,村镇经济向前发展与田园化是没有矛盾的。

(4) 功利思想给总体规划带来的矛盾

以往我们所作的总体规划,无论是城市、小区、居住院落、公共建筑群、县镇、村落等,规划的着眼点几乎完全放在功能关系上。很少把人的思维因素纳入规划之中,只见物不见人,所要塑造的环境空间被固定

(下转 16 页)

谈谈中国传统的书院建筑

张 卫

书院建筑是我国古代独特的教育制度的产物，是中国传统社会中的一种特殊文化现象。它起源于私人聚书、藏书、读书，继而发展为包括藏书、读书、著书、讲学授徒、祭祀等多种功能的教育场所。书院作为中国古代官方教育的一种补充形式，不仅在办学目的、办学形式和教学措施方面与学宫有所不同，而且其建筑的文化内涵、艺术特色和审美风格也有自己的独到之处，成为中国传统建筑体系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一、书院建筑的发展概况

书院建筑的产生在学宫之后，它的兴起伴随着士阶层的形成，在一千多年的发展过程中，书院建筑的兴衰变迁与学宫的发展相反相成，并反映了朝廷与士阶层之间的关系。

（一）书院建筑的起源

我国是一个有着悠久教育历史的国家，早在奴隶制的夏、商时期，就有“庠”、“序”等官办学校出现。西周时，初步制定了包括国学和乡学的学制系统。春秋战国时期，随着社会的激烈动荡，周以来的各种制度受到巨大冲击，出现了“礼崩乐坏”的局面，中国社会的各阶级、各阶层发生变化和流动^[1]，在这个变动过程中，“士”从固定的封建身分中解脱出来，变成了可以自由流动的四民之首，从而开始形成一个自觉的社会集团^[2]，这个集团的形成带来了百花争放、百家争鸣的学术局面，这种文化和学术上的空前繁荣使教育制度也有重大变革。此时，私学兴起，突破了“学在官府”的单一状况，逐步发展出既不同于周制中的国学，也不同于乡学的教育形式，为以后书院的出现奠定了基础。

至汉代，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经济达到第一个繁荣期，儒家思想取代诸子百家而一统天下。汉代的教育制度也在西周的基础上吸收了私学成分，形成官学与私学并存的体系。其中官学包括对应于周代的国学与乡学两部分，私学则包括书馆和经师讲学两部分。

其后，几经朝代变迁，教育制度几度兴衰，但基本沿袭了汉代的体系。直至唐中叶以后，由于官学随政治的混乱、战争的频临与财政的困难而衰落，作为官学补充和对立物的私学便兴盛起来，出现了最早的私人藏书、读书及授徒的书院，如：贞元初的张九宗书院（今四川省遂宁市境内），贞元间或元和间的桂岩书院（今江西省高安县境内），以及无和间的石鼓书院^[3]。

（二）书院建筑的发展

在唐代开始衰落的官学，经过战乱纷起的五代至宋初已呈衰废状态，这便给书院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时机。在宋代，以四大书院（亦有六大、八大书院之说，一般指白鹿洞、岳麓、石鼓、嵩阳、茅山、应天、龙门、徂徕等书院）为代表的一批影响较大的书院出现，标志着书院的教育制度、教学经验以及建筑的规制和风格走向成熟。

元朝，书院进一步发展。元朝立国之后，宋朝的很多文人士大夫为保持气节，入元不仕，退而讲学。统治者为了缓和士的反抗情绪，争取他们为元朝服务，对书院加以提倡和赞助，故元代书院发展迅速，不亚于宋。

明代初期，书院建筑的发展经历了一个沉寂阶段。这主要是因为朱元璋极为重视官学，他通过自中央到地方的官学培养官吏，对学校控制很严，曾颁布卧碑立于官学之中，以加强思想统治。在这种气氛之下，学风比较自由的书院必然遭到厄运，一批著名的书院奉命撤消，或并入官学（如东湖书院、宗濂书院），或长期废弛（如白鹿洞书院、盱江书院）。直至正德年间，明朝政治经济由兴盛转向衰落，官学走向腐败，而理学大有发展，王守仁、湛若水等理学大师到处讲学，并创立和主持修葺书院，致使在全社会范围内形成办书院的风气，书院建筑不仅渐渐复兴，而且达到又一个高潮。

（三）书院建筑的变化

自元代开始，书院出现官学化倾向，明清时这种倾向进一步发展。官府利用官学化手段对书院加以控制，派官吏主院掌教，将书院学风转向登科取第、博取功名，随之而来的结果是书院更加普及，数量大大增加，清代书院设置已遍及当时全国的十九个省区，数量达

一千九百余所^[124]。

清末,由于外国势力的入侵,中国国内政治经济情况发生急剧变化。而此时的书院教育大都讲求科举之学,师生埋头时文帖括,远不能为处于雨急风骤之中的中国培养实用的人才,于是,出现了一批新创办的传授西学或兼教中西学的书院,也有的书院开设了一部分新课程。这样,传统的书院建筑已进入解体和彻底变革的时期。光绪二十七年(公元1902年),清廷改革学制,正式下令改书院为学堂,书院建筑就此结束了它一千多年的发展历史。

二、书院建筑的基本特点

从私学基础上演变而来的书院建筑,在其漫长的发展过程中,不断积累和完善,逐步形成独特的建筑风格。其主要特点表现为以下四个方面:

(一) 多种功能的综合体

书院建筑自唐宋五代创建以来,从单一的私家藏书,逐步发展为包括讲学、授徒、藏书、祭祀、居住、游息等多种功能的综合性建筑,具有较大规模,并形成了一套制度,成为一个独立的建筑体系。

书院中的一切活动都与教育过程相互渗透,不可分割,成为教化过程中不可缺少的因素,这便从客观上要求书院创造能适应多种功能需要的建筑群体和空间环境。同时,书院的一切教化工作不仅局限于本院的师生参加,而且也面向社会,书院集学校与地方学术文化活动中心于一身,这也要求书院建筑提供一个能与社会共用的满足不同层次交往要求的场所。

在书院宠杂的功能当中,讲学、藏书、祭祀被称为“三大事业”而占主导地位。因此,讲堂、藏书楼、祭殿成为书院建筑的主体,少数书院由于受官学影响,在书院外另设文庙祭孔(如岳麓书院、龙山书院),也有些较小的书院将藏书和祭祀两项功能合并,共用一座殿堂(如三潭书院);生活居住所用的斋舍,一般围绕主体部分布置,以利于将生活与学习紧密结合;游息部分则较为灵活,多结合周围的自然环境设园林或景点,不仅渲染了书院外围的教化气氛,也为当地提供了一处风景游览之处,表现出书院与社会的交流关系。

(二) 礼乐相承的群体组织原则

书院建筑的讲堂、藏书楼、祭殿、斋舍以及园景五大部分,采用严谨的中轴对称布局,结合庭院天井的组织,表现出井然有序、浑然一体的特征,体现了中国传统的礼乐思想,具有鲜明的社会群体意识。

“礼”是中国古代封建社会中一切社会观念的基础,它包括整套严密的典章制度、道德规范,以及行为准则、生活方式,礼的本质是上下尊卑的等级伦理秩序;“乐”则是礼的艺术表现形式,是一种礼的精神与艺术精神的综合表现,是一种调和各种等级类别关系

的“和”的手段。正如理学家程颐所说:“礼只是一个序,乐只是一个和”,礼与乐是一对互不相同而又不可分割的矛盾。

按照“中正无牙,礼之质也”的精神,中国古代从城市到一般较具规模的建筑,都以居中为尊,力求轴线对称的理想布局,通过轴线层次序列,区别尊卑、上下、主次、内外,达到统一有序的目的。同时,运用不同特点的庭院天井的组合,达到亲和的目的。

书院建筑在群体布局 and 空间组织上,也体现出传统的礼乐相成、和序统一的思想。书院以讲堂为中心,将大门、讲堂、祭殿、藏书楼依次排列在中轴线上,形成一组多重院落空间,突出书院“三大事业”的主导地位。斋舍则对称分列于中轴线两侧,或前或后,各成并院,以满足居学读书的需要。其他部分,如供游息的园林、亭阁等则因地制宜,灵活配置。

(三) 天人合一的环境观念

书院在选址和环境经营方面,注重自然景色的优美,也重视历史古迹、名人遗迹等人文因素,更强调人与自然环境的协调统一,表现了“天人合一”的理想追求。

书院相对于学宫而存在,它不象学宫那样作为一种统治的象征盘踞在城中,也不象普通的民居那样自由地散处于山野田间,而是选择自然环境和人文景观俱佳的名胜之地。这首先是受书院创建之初的唐末五代士人的影响,那时,由于战乱,名士纷纷隐居山林,聚徒授学,形成书院远离“城市嚣尘”的传统;其次,作为儒家理学阵地的书院地处山林,既加强了与佛、道的交往,也激化了争夺地域的矛盾,使书院始终不愿放弃名山胜地;除此之外,还有最重要的一点,那就是书院“通天地人之谓才”的教学育才思想,决定了书院择胜而处,中国古代的士自孔子时代始便注重“修身养性”,魏晋以后,迫于政治陷害和战争危胁,士发展了一套隐逸文化体系,他们不满现实,以淡泊清高自居,寄情山水,潜心学术,追求超脱尘俗,清心寡欲的生活,因此,书院的一切环境也要满足“净心”、“悦情”、“深源”、“妙用”的天人结合的境界。

书院建筑不仅在环境的选择上充分利用自然环境的特点,而且重视利用和表现人文景观的特点。注意保护风景文物和历史名迹,做到文景结合,强调书院的学术渊源,突出对历史人物的纪念。地灵人杰,地以人重,书院祭本师,正学源,崇道统,以创造一种尊贤尚德、尊师重道的气氛。做到人与自然、文化与风景、建筑与环境的有机结合。正如《岳麓书院记》中所述:“自此之后,岳麓之为书院,非前之岳麓矣,地以人而重也”。

书院的选址也曾因官学化影响而发生一些变化。明末至清代,官府为加强对书院的控制,以及为考课的便利,令许多书院放弃山林胜地,迁入或兴建于人

口密集的城镇之中。这种强制措施使一些书院的环境与教学要求之间产生矛盾而呈恶化趋势,于是,某些书院又不得不改建或迁址,形成“半依城市半郊原”的折衷的选址做法(如崇文书院)。

(四) 强烈浓厚的文化气息

书院为古代士大夫聚居求学之处,且多由退隐之士主持,并由他们参与建设经营,捐资修建,因此,书院建筑更多地反映了士阶层的建筑观念和美学情趣,它通过建筑内部亲切适用的空间尺度,朴实无华的建筑形象,清新淡雅的装饰和色彩,以及反映修身之道、为学之方的书画匾联等创造一种情景交融的空间气氛,显示出深刻的文化内涵和高雅的格调。

中国的士多遵循朴素淡泊的生活准则,反对物欲羁绊,并强调以善为美的美学思想。反映到建筑上,便反对土木之奢,提倡俭朴之风,以“用财少,为利多”为原则。书院建筑的体量和空间均以适合人的活动尺度为出发点,不为显示尊卑地位而夸大比例。并且,反对富丽堂皇、矫揉造作的建筑形象和装饰,真实地表现建筑材料结构本身的美。如湖南的大部分书院,建筑外部多显露其封火清水山墙,灰白相间,虚实对比,格外清新明快,建筑内部也显露清水构架,装修简洁,略加点饰,更显素雅大方。

书院建筑多选用黑、白、灰、棕(棕红)等中性的、较为沉着的色彩,虽与民居色彩上有某些相似之处,但运用更加多变,更加细致,这些色彩或作为建筑的主色调,或作轮廓线,既可达到强烈的对比效果,也易获得调和感,表现了文人追求庄重、质朴、文雅的真性情。

书院建筑还大量使用书画匾联,以表达深刻的寓意,揭示、启发人们理解主题和阐发联想,同时,还具有极强的教化内容,指明学派师承关系,宣传人生哲学,概括书院影响及历史渊源。

三、研究书院建筑的意义

书院作为一种传统的办学方式已随着历史的流逝而成为过去,但遍及全国各地的书院建筑却给我们留下了许多值得思考的问题。

对于中国传统建筑的研究以前多集中于宫殿、坛庙、学宫等官式建筑,大多数人认为中国的建筑传统唯

有通过这些建筑才表现得透彻而深刻。近年来,随着对建筑民族性、地方性的重视,民居等民间建筑也被广泛地关注和研究。但是,对书院建筑的研讨却少得可怜,而书院建筑既不同于皇家贵族的官式建筑,也不同于平民百姓的民间建筑,具有其重要的研究价值。

书院建筑是一种教育场所,它始终与中国古代的士阶层紧密相联^①,处处反映出文人士大夫特有的人生准则、道德理想与审美追求。

士阶层是处于皇家贵族与平民百姓之间的中间阶层,他们的性格特征、生活道路与前两者不同。书院是由文人名士创建的 building 类型,书院的选址、命名、设计营造等无不在士的直接参与下完成,而且,它的服务对象也是文人士大夫,因此书院最集中、最典型地表达了士阶层的一切物质与精神追求,在中国传统建筑体系中再也找不到比书院更纯粹的文人士大夫建筑了(文人园林也是由文人参与经营和使用的建筑类型,但其文教功能、学术文化气氛却不同于书院)。

正因为文人是书院建筑的主人,书院建筑忠实地反映士阶层的文化特点,使得书院建筑在文化内涵和艺术价值上达到了官式建筑和民间建筑均未达到的高度。

中国古代的士首先是儒者,他们积极入世,有着批判和改造现实社会的理想与热情,具有鲜明的儒家思想。另一方面,由于士处于社会的中间阶层,政治地位极不稳定,残酷的社会现实又使他们在生活态度上偏向于道家,清心寡欲、自然无为的人生哲学在士阶层中有着广泛的共鸣,因此士具有儒道互补的文化特征。这一特征正好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体系的核心问题,具有典型意义。书院建筑成为这种文化特征的物质载体,它从物质因素和精神因素两方面充分地体现了士阶层的这种颇有代表性的文化内涵,从而使建筑本身也具有了深刻的文化艺术价值。这一点是官式建筑和民间建筑都难以达到的。

今天,中国的建筑创作和理论研究已进入多元化、多层次发展的阶段,书院建筑被淡忘的历史没有理由再延续下去了,在此,愿将本文作引玉之砖,以呼唤对书院建筑全面深入的讨论和研究,为进一步探索中国建筑传统提供新的视角。

注释

①《士与中国文化》第十二页,余英时,上海人民出版社。

②《士与中国文化》第八十七页,余英时,上海人民出版社。

③《白鹿洞书院史略》第二百二十三页至二百二十四页,李才栋,教育科学出版社。

④据《中国古代的书院制度》,陈元晖。

⑤参阅《中国古代的士与文人建筑》,张卫,《全国第二次建筑与文化学术讨论会论文集》,《新建筑》杂志。

武当山道教建筑

——兼谈明代皇室家庙营造思想

祝建华

概述

武当山,又名大岳太和山,位于湖北省西北部丹江口市境内,横亘八百里,环列七十二峰,三十六岩,二十四涧。群峰攒秀,风景幽奇。是我国道教著名的洞天福地。亦是我国重点风景名胜区。

在道教典籍里,武当山是“上古玄武得道飞升之地”,故曰:非真武不足以当之,简称武当。元成宗大德八年(1304年)被敕封为“武当福地”。明成祖永乐十五年(1417年)被敕封为“大岳太和山”,冠于五岳之上。

武当山最早的道教建筑建于唐代早期,据记载唐贞观年间,均州大旱,武当山节度使姚简在此求雨,“得五龙显圣、普降甘露”,太宗敕于中山,别创五龙观,以旌灵异”。唐·至德到大历年间又建“太乙”“延昌”两祠。乾宁三年建“神威武公新庙”。

北宋真宗赵恒推崇道教,封真武神为:镇天真武灵应佑圣真君。天禧二年下诏“升祠为观”。宋徽宗赵佶自封教主道君太上皇帝,政和六年敕建“紫霄元圣观”、“五龙观”^①。全山道教建筑形成一定规模。南宋宁宗庆元六年,金兵南下,均州宣慰孙嗣将治所迁到武当山紫霄观,据此抗金十六年。宋亡,全山道教建筑大部分毁入兵火。

元世祖忽必烈登基之初,因道教三十六代天师张宇演送去“天运在元”的神符,故放纵道教以安定江南。至元十二年重开武当山道场,道士鲁大霄等率众重修紫霄观、“辟荆”建殿;道士张守清等人又在南岩凿壁建舍。至元二十三年忽必烈下诏“改观为宫”。至大元年九月到第二年三月,京师无雨,皇太后遣使诏请武当山道士张守清祷雨成功,施舍私钱修建南岩宫,赐额“天乙真庆万寿宫”。元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因其诞辰与真武神相同,皇庆元年加五龙宫为“大五龙灵应万寿宫”,并扩建真武殿^②。延祐年间,张守清数次应太后之诏在武当山祷雨“屡逢亢旱方虞率土之灵申祷上玄

并获甘霖之喜”。张守清因功受封为“体玄妙应太和真人”,达官贵人也纷纷捐款,先后建成“浩然斋”和“火雷君沧水圣洞”。到元末,全山三十六座岩洞都建有不同规模的岩庙,“其屋壮丽严峻,洞达高广,盖与此山相雄”。

明初,太祖朱元璋鉴于僧侣、道士娶妻养妾,便着手整顿教团。洪武十五年设道录司,分正一、全真两派,在武当山设提点一名,负责管理全山教务。永乐年间,成祖朱棣因政治需要,大兴武当,整个修建工程从勘测设计到施工管理,全部由朝廷安排,皇帝直接过问,经过近十三年时间,穷尽“天下军民之力、辛勤劳苦、涉历寒暑,久而后成。所耗费钱粮,难以数计。”^③共建成三十三处大型建筑组群。并巧妙地将武当山变成皇室家庙。嘉靖年间,明世宗朱厚熜又二修武当,将武当山建筑推向辉煌时期,从均州净乐宫到天柱峰太和宫一百二十华里,沿途布满了建筑组群。

清兵入关,朝廷鉴于道教与明皇室联姻的特殊关系^④,对道教采取简约的政策,武当山虽未断香火,却已呈强弩之末,不见昔日风采,皇亲国戚无人光顾。二百多年间,虽有个别庙观扩增,而经费来源却全部靠香客的资助和道人的募捐。清末民国初年,军阀割据,道教更加衰败,庙观因残破不断倾塌,已不复当年的面貌。

永乐皇帝大兴武当与明皇室家庙的形成

公元1391年,明太祖朱元璋驾崩,太孙朱允炆继位,是为惠帝,年号建文。建文元年,惠帝削藩,燕王朱棣起兵反抗,继过三年战争,朱棣攻占南京,建文皇帝出逃,朱棣即皇帝位,年号永乐。

永乐初年,由于朱棣因藩王经武力而承大统,政治舆论对其十分不利,纲伦中“以臣弑君”“同宗相战”压力很大,尤其是建文皇帝一班旧臣不肯归服,大学士方孝儒大骂“燕贼篡位”,朱棣为此大开杀戒,一气诛杀

数万人，史称这次“镇压”为“壬午殉难”（建文四年为壬午年）。另外，当时社会上还流传着朱棣非太祖嫡子，而是高丽后裔的说法。原来朱棣生母硕妃是高丽进贡给朱元璋的美女，朱棣出生时，因不足月，便有人禀报硕妃不轨，硕妃由此遭到冷落，最后郁郁而死。面对这种形势，为了巩固政权，安抚人心，永乐皇帝一面宣称自己是“奉天靖难”，一方面从理论上寻找依据。恰好永乐三年、四年，武当山五龙宫道士李寿希两次派人送“榔梅仙果”敬献给皇帝，以告天下呈祥。朱棣十分高兴，于便殿召见，由此而得知武当山乃北方玄武神飞升之地。为此又专门诏见武当山道士简中阳，详细询问了北方玄帝升真事迹。经过酝酿，永乐皇帝决定兴建武当山，宣扬真武显圣而坐镇南方号令天下群真的说教，以此大造“天人合一”“君权神授”的舆论，达到进一步巩固政权的目。

永乐十年（1412年）三月，朱棣颁下二道圣旨，命道录司右正一孙碧云前往武当山实地勘测“尔往审度其地、相其广狭，定其规制，悉以来闻，朕将卜日营建”。同年七月，规划工作就绪。十一日永乐皇帝发布《敕官员军民匠人等》圣旨：“武当山天下名山，是北极真武元天上帝修真得道显化之处，历代都有宫观，元末被乱兵焚尽。至我朝，真武阐扬灵化，荫佑国家，福被生民、十分显应。我自奉天靖难之初，神明显扬，威灵感应之多、言说不尽。那时已发诚心，要就北京建立宫观，因为内难未平，未曾满得我心愿，及即位之初，思想武当山正是真武显化去处，即欲兴工创造，缘军民方得休息、是以延缓至今，起请些军民去那创建宫观、报答神惠，上资荐扬皇考皇妣，下为天下生灵祈福”。并颁布《大明御制玄教乐章》十四首，《大明御制天尊词曲》六首^⑤。令全国演唱、影响皇帝就是真武神下凡。九月朱棣命隆平侯张信、附马都尉沐昕、礼部尚书金纯、工部侍郎郭进及京官郎中、主事、都指挥、参政、知府、州同知等军政官员四百名为钦差把总提调官员，率军民工匠二十万人，开赴武当山营建道场。

营建工程从永乐十年九月十八日开工至十二年二月十九日结束，历时十三年。共建成净乐宫、遇真宫、玉虚宫、五龙宫、紫霄宫、南岩宫、朝天宫、清微宫、太和宫等九宫；建成太玄观、元和观、复真观、回龙观、仁威观、威烈观、八仙观、龙泉观、太常观等九观及附属三十六座庵堂、七十二座岩庙、近百计的石桥、牌楼。形成了“太和绝顶化城似，玉虚仿佛秦阿房。南岩宏奇紫霄丽，甘泉九成差可当”^⑥的巨大规模。

永乐皇帝在整个工程修建中，侧重把握几个大的环节。

首先在总体规划指导思想上，变原有真武修道升仙之“福地”为真武道坐镇天下的“圣地”，将原活动中心紫霄宫、南岩宫、五龙宫延伸到天柱峰，形成了以

金殿为中心和全山建筑与之相吻合的建筑格局。

在总体布局上，金殿修建在海拔1612米的天柱峰顶，位置最高，有君临天下之感。

在建筑形式和等级上，全山建筑仅金殿为重檐庑殿顶，九采斗拱；在建筑材料上、金殿为铜铸鎏金，仅鎏金所耗费黄金多达万两。

二是亲自抓金殿的铸造工作，永乐十年、工部奉旨敕建金殿，“治铜为殿、重檐叠拱、羽飞瓦立、饬以黄金范、玄帝金像、左右灵官玉女、捧剑执旗天将”。

金殿全部铸件在京都南京铸造，朱棣验收后，十分高兴，为了安全运达武当山，决定派军队护送，永乐十四年九月初九，朱棣颁下圣旨《敕都督何浚》：“今令尔护送金殿船只，至南京沿途、船只务要小心谨慎、遇天道清明、风水顺利即行。船上要十分整理清洁、故敕”。运送金殿的船只，每到一个码头，地方官员必焚香迎送、经汉水、丹江一直送到武当山脚下。

三是抓天柱峰的营建。为仿天上“玉京”胜景，金殿台基为花岗岩雕砌，四周装修白石花。栏杆，前置月台。金殿在天柱峰落位后，朱棣又决定修建紫禁城，永乐十七年下旨敕隆平侯等：“大岳太和山山顶砌造四周墙垣，其山本身分毫不要修动，其墙务随地势高下、不论丈尺、但人过不去即止，务要坚固壮实，万万与天地同其久远，故敕”。紫禁城由重达千斤的条石依岩砌筑，四面置石雕天门以象征天阙，从而最后形成“白玉黄金世界”的人间仙国。

四是狠抓庙观神像的奉供。相传，朱棣曾诏全国画匠为真武塑像，由于塑像不能表达皇帝的心意，朱棣杀了不少人，后来干脆诏来高丽工匠按照自己的形像塑造真武，送往武当山供奉。今天我们可以清楚的辨认出金殿里端坐在龙椅上身着文袍武甲的铜铸鎏金真武神像，与北京故宫中悬挂的永乐皇帝明成祖，是一对南呼北应的孪生兄弟。为了使这一工作做得更加周密，在真武修仙最重要的二处住所太子坡和太子岩，也要塑造自己的形象。永乐十七年四月，朱棣敕隆平侯张信、附马都尉沐昕等：“太子坡和太子岩两处，各要童身真像，尔即照依长短阔狭，备悉画图进来，故敕”。所谓“童身真像”“长短阔狭”即是按朱棣少年和青年的形象制作。与此同时，朱棣敕封真武神“祖师北极镇天真武灵应福德佑圣真君玉虚师相玄天上帝金阙化身荡魔天尊”。

为了使“家庙”基业传之远久，永乐皇帝下令着法司拨徙流犯人五百五十户三千一百二十三人编成五里，送往武当山，每户拨荒闲田五十亩，每年交七石斋粮及茶盐、棉花供养宫观。同时免去均州千户所军余杂泛、征差、屯田子粒，专一派军巡视山场，着役洒扫宫观、烧造砖瓦、维修宫观。着令湖广布政司定时巡视，负责保养。并敕四十四代天师张宇清从全国征调德高